

## 史学传承与资鉴

## 环境史学论要

焦润明

(辽宁大学 历史学院、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 辽宁 沈阳 110036)

**摘要:**环境史学是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结合得最为紧密的一门新兴边缘交叉学科。其研究对象是以人类与环境的互动,自然生态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制约,人类活动对原生态自然环境的影响等等为主要内容。生态文明史观是核心指导理论;其研究方法在承续传统史学的研究方法外,大量借助于其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方法,其中,史实综合互证法、实地调查法、口述访谈法、计量统计法为最为有效的研究方法。该学科扩大了史学的研究领域,在增加科学要素,强化史学的公共性等方面发挥作用巨大。

**关键词:**环境史学;生态文明史观;公共史学

**中图分类号:**K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91(2014)01-0141-13

环境史学是近十余年来崛起的历史学边缘交叉学科之一。许多学者,尤其是世界史学者在介绍美欧学者研究成果的过程中,对环境史学的概念、研究对象以及方法等问题都进行了探讨,贡献较大。同时,从事历史地理、灾荒疫病史研究的部分学者尽管研究环境问题较早,但受此影响,也明确地围绕着环境史学相关问题展开讨论,为中国环境史学的成立提供了学术基础。相关各方的讨论产生了不少成果,有争论也有共识。不过,当前环境史学研究还有一种倾向,即多奉西方史家的著作作为旨归,以西方史家的马首是瞻,在所取得的成果中以介绍西方相关研究成果为多,而以建立中国人自己话语系统暨建立自己学科体系为指向的成果较少。不能不说是个遗憾。笔者以为,在当代史学研究高度国际化、综合化的今天,我们需要参考美欧的研究成果,但更要密切地结合本土史学资源,以研究中国本土的生态环境为核心,建构起能获得国际共识的、中国本土的环境史学。既在环境史学的概念之下,各自从自己的研究角度或学术领域切入主题,形成的共识越多越好,也不怕分歧,最重要的是为建设中国的生态文明提供历史背景、经验教训,为扩大公共史学领域,增加历史学的科学要素和人文内涵作出自己的贡献。

环境史学作为历史学的一门新兴学科,已被学界所肯定,但它还很很成熟,还处于发展过程中,从概念到研究对象还需要深入讨论。当此之时,笔者也想对此发表看法,谈谈自己的研究心得。

## 一、环境史学的概念界定及研究动因

## (一)关于环境史学的定义问题

环境史学是历史学一门新兴的边缘交叉学科。它主要是以历史上的环境问题作为研究对象而建构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它所关注的是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学术界对于环境史学还没有统一的概念,从目前介绍的西方学者关于环境史学的概念就已是五花八门。而中国从事世界史研究的学者由于服膺西方学术派系之不同,故在介绍和融汇其概念方面各有侧重,而那些专门从事于中国本土环境史研究的学者,由于研究的微观领域不同,也对环境史学概念在界定上存在着分歧。

目前,中国学术界公认环境史学作为一门历史学分支学科,首先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环境史学一词最早是由美国学者纳什(Roderick Nash)在《美国环境史:一个新的教学领域》中提出的。他认为,环境史学是“对环境责任的呼声的回应”,研究“历史上人类和他的全部栖息地的关系”。斯坦伯格(Theodore Steinberg)认为,环境史学要“探求人类与自然之间

收稿日期:2013-11-28

作者简介:焦润明,男,辽宁本溪人,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史学理论及中国近现代史。

的相互关系,即自然世界如何限制和形成过去,人类怎样影响环境,而这些环境变化反过来又如何限制人们的可行选择”。斯图尔特(Mart Stewart)认为,环境史学是“关于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历史,是关于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各种关系的历史”。麦克尼尔(John Mc Neil)认为,环境史学研究“人类及自然中除人以外的其他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1〕。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给环境史学定义为“环境史并非新的分支学科,而是对历史及其核心问题的广泛的、新的再想像。”〔2〕威廉·克罗农(William Cronon)对环境史学的界定较有代表性,他在其代表作《土地的变迁》的引言部分,给环境史界定为,“环境史就是这样一种历史,它把研究范围从人类制度(经济的、阶级的和性别的制度,政治组织、文化礼仪)扩大到给这些制度提供舞台的自然生态系统。这种历史必然要把一系列非人类的因素置于历史舞台的核心。”在《环境史的作用》中又定义为,“(传统)历史研究范围以外的自然生态环境,研究经济、阶层政治等社会属性在自然生态环境中发生作用”;“探讨某一特定地区的特别之处和正在变化的生态系统内人类社会的活动;探讨不同文化中有关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对环境政策的研究。”〔3〕上述西方学者关于环境史学概念的界定各有侧重,对中国环境史学的研究具有极强的借鉴及示范作用,且对中国环境史学者都曾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上述所列西方环境史专家所提出的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中,纳什的概念明确强调了人地关系,强调了环境史学的主要任务是解答环境保护运动所提出的环境史课题。斯坦伯格的观点重点在于强调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即人类如何影响了环境,反过来环境如何影响人类的历史问题。麦克尼尔则重点放在“除人以外的其他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强调非人的“荒野”在历史研究中的意义。唐纳德·沃斯特认为有多少学者就会有多少关于环境史学的定义。而且,他还否认环境史学是历史学的新的分支学科,只是对历史核心问题的“广泛的、新的再想像”。显然,他的定义隐含着环境史学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和思考方法的蕴意。威廉·克罗农则把自然生态系统作为环境史学的重要内容加以考量的。我们从中国当代环境史的论著中可以明显地发现西方学者学术思想政治的影子,甚至连环境史学的概念界定都是以西方史学家的概念为模板的。

在西方有关环境史学的所有概念中,以美国环境史学会提出的概念最具有代表性:“环境史研究历史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它力求理解自然如何为人类行动提供选择和设置障碍,人们如何改变他们所栖息的生态系统,以及关于非人类世界的不同文化观念如何深刻地塑造信念、价值观、经济、政治以及文化,它属于跨学科研究,从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自然科学和其他许多学科汲取洞见。”〔4〕这个概念综合并吸收了上述相关史家所下定义的相关内容,突出强调了历史上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以及研究人类如何改变了他的栖息地的生态系统,强调了环境史学的跨学科特性。总括而言,西方学者对于环境史学在定义上包括如下内容:研究历史上人类与他的全部栖息地的关系;研究传统史学研究范围外的自然生态系统;研究不同民族文化中人与自然关系的政治思想、环境思想以及它的跨学科性。

中国大陆学者对于环境史学的理解以及在概念上深受西方学者的影响。不过,不同的学者由于学科专业素养和研究倾向迥异,故在界定环境史学概念方面仍有不同差异。景爱认为,“环境史就是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史,它的对象不是环境变迁,而是人类与自然物质交换、能量交换的历史过程及其结果。”〔5〕包茂宏认为,“环境史就是以建立在环境科学和生态学基础上的当代环境主义为指导,利用跨学科的方法,研究历史上人类及其社会与环境之相互作用的关系。”〔6〕王利华认为,“环境史运用现代生态学思想理论,并借鉴多学科方法处理史料,考察一定时空条件下人类生态系统产生、成长和演变的过程。它将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视为一个互相依存的动态整体,致力于揭示两者之间双向互动(彼此作用、互相反馈)和协同演变的历史关系和动力机制。”〔7〕“环境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它既是一个新史学领域,更是历史研究的一种新思维。”〔8〕他主张把“人类生态系统演变作为环境史研究的基本内容”。他还承认“笔者内心更愿意将环境史当做一种新的历史认识方式和解释体系。”〔9〕高国荣认为,环境史学是“以生态学为理论基础、着力探讨历史上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以自然为中介的社会关系的一门具有鲜明批判色彩的新学科。”〔10〕梅雪芹认为,环境史“是研究由人的实践活动联结的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互动过程的历史学新领域。”〔11〕环境史研究要“紧紧围绕‘人及其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史’来展开,不仅要具体地、历史地研究人与自然环境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而且要深入认识和揭示这一关系背后的人与人之间历史的、现实的关联与矛盾。”〔12〕滕海键认为,“它以人类和人类所面临的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探究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在历史上是如何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13〕上述所列中外学者有关环境史学的概念,恐有挂一漏万之嫌,只是选出较有代表性的概念表述,以利于进一步论证之需要。

中国环境史学者在学术研究理路特别是在概念界定上深受西方学者影响,这大概是不争的事实:第一,目前国内从事环境史研究的相关学者中大多是从世界历史研究的学者,故欧美环境史学思想大都是由相关学者率先向国内介绍引进,所以在学术上自然深受西方话语系统的影响亦有其必然性;第二,不管中外学者对环境史学如何认识,对学科概念如何界定,在环境史学作为历史学一门分支学科这点上具有共识性。由此,关于环境史学讨论中的学术共识部分甚多。学术讨论的

目的就是要在更大的范围内争取达成更多的共识,以利于学术之进步。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学者中,王利华对环境史学概念的界定最有代表性。综其要点有二:他主张把人类生态系统作为环境史研究的主要内容;认为环境史学是一种新的认识方法和解释体系。如果按其所说,那么历史研究就全变成环境史研究了,也就没有其他的分支学科了。他在《作为一种新史学的环境史》一文中更认为,在近百年中所演绎的两次“新史学”之一的当代的“新史学”中,环境史学具有“将自然科学理论方法引入历史研究的倾向”,其“新”“主要表现在史学领域的进一步拓展及其科学性质的进一步强化。”〔14〕因此环境史学也可以称为现时代的“新史学”体系,以示别于传统史学。大有把环境史学作为历史学在新时代的科学历史主义代名词的倾向,而不是把它作为历史学的一个边缘交叉学科来考量的。这种认识固然反映了其对环境史学的认识,相关表述亦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彰显了其学术的独特性,但同时也极易引起学术争议。尽管有学者称,有多少研究者就会有多少种环境史学概念,固然能说明环境史学本身的丰富性和多歧性,但是,相关讨论越充分,共识的部分越大,学术对话也就越容易。

基于此点,在综合中外各家有关环境史学概念的基础上,结合笔者个人的研究体会,试就环境史学定义问题提出自己的界定:环境史学是以历史上与人类相关的环境作为研究对象,以生态文明史观为指导,借助于生态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对人们所关心的环境问题进行史的考察而形成的一门历史学新兴边缘交叉学科。这个概念有如下几层意思:第一,环境史学是历史学中的一门边缘交叉学科,是历史学的分支学科,而不是别的学科;第二,每一个学科都有自己固定、稳定的研究对象,学科始得成立。环境史学的研究对象则是历史上的与人类相关的“环境”,强调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第三,任何一门学科都会有自己独特的理论与方法,而环境史学的指导理论则是生态文明史观,它吸收了当代世界通行的人类共有一个地球、共有一个家园,保护环境就是保护人类自身,是发展、延续文明的思想。而在研究方法上,除了历史学科固有的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外,更多地吸收了生态学的研究方法和其他一切自然科学中有利于历史研究的新科学方法;第四,环境史学是历史学中最具有现实应用性的部分,它着重于对那些人们关心的环境问题背后的成因进行历史追溯,以探讨其利害得失、总结经验教训,提高人们的环境意识,丰富人类的思想宝库。

## (二)关于环境史学的研究动因

环境史学为什么能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异军突起并成为历史学中的“显学”,其崛起原因和研究动因皆值得探讨。笔者认为,在当代中国学术界,环境史学的崛起和研究动因主要有如下二条:一是中国国内的环境问题已日益凸显,给学术界提出了新课题,需要史学界以历史追溯的方式来回答现实提出的环境问题,满足于当下对历史经验教训借鉴的现实需要;二是在历史学科全面振兴,史学面临着综合化、电子化、微观化(也有称为破碎化)趋势中,史学自身如何更好地适应时代发展与进步要求,完成自身的华丽转身,这就需要构建起有中国特色、有中国人话语权的史学体系,包括建构环境史学科理论体系。

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西方工业文明的发展,使“人定胜天”的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人类无限制地向自然索取,以满足自身的欲望,结果破坏了自然原有的生态平衡,也使我们人类处于与自然的矛盾冲突之中。大规模森林的砍伐,土地的过度开垦,农业发展的过程中违背地球自然形成的气候带向草原进军,过度的破坏草原,造成了荒漠化。工业的发展、人口的集聚、大气的污染、三废的排放,严重地破坏了我们生活环境,人类自身亦深受其害,这一切都引发了我们的反思。这是环境研究成为热点的重要原因之一。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也是一个污染很严重的国家之一,除了传统的污染外,高科技的滥用所导致的新的污染,如核放射性尘埃污染、杀虫剂污染的严重后果在美国表现得最为典型。故引发了环境保护运动的兴起,而环境史就是美国历史上的自然资源保护运动与战后环境保护运动发展的产物,同时它与自然科学特别是生态学思想的发展和普及也有直接的关系。其学科创建可以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环境史学会和《环境评论》杂志的创办为标志〔15〕。

在欧洲,环境史研究作为学术界对生态危机和环保运动的一种积极回应,首先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德国兴起。在80年代中期以来的瑞典、芬兰、英国、德国等国,环境史研究更关注于工业化及城市化带来的环境问题。这种关注在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之后达到了顶点。长期的空气污染所导致的森林枯萎以及北欧湖泊的酸化等,使历史学家越来越意识到人与自然的互动值得研究。其本质是历史学者对公众要求的一种回应〔16〕。总之,相关论著都明确讲到了环境史学是在战后环境保护运动的推动下兴起的历史边缘学科。笔者以为,环境史学只所以在美国、英国那样的西方国家首先产生,这与其学术体系开放,学术探讨无禁区,易于产生学术的多样性有关外,更主要的还是与欧美社会高度的工业化及其所带来的严重的环境问题引发了人们的普遍关心有关。

环境问题催生了环境史学的崛起,这条规律也同样适用于中国。即中国环境史学的崛起也是由于中国自身环境问题的

日益严重引发的。笔者不认同环境史学在中国的产生并引发讨论仅仅是个别学者从西方引进的结果。环境史学在中国的崛起,固然也有西方环境史学研究的示范效应,但主要还是中国本土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引发的。90年代后,在片面追求经济增长效应的推动下,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随之而来,江河污染、空气污浊、酸雨、灰霾天气频现,环境恶化严重困扰国人。癌症村的出现更反映了某些局部地区环境恶化已达到了极点。环境问题对整个民族的生存发展都带来严重的危害,已成为整个社会都普遍关心的社会公共问题。遂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参与,即这种严重关注必然要投射到学术研究中来。它不仅局限于某一具体学科或某一具体的人,而且几乎所有学科都纷纷参与。如不是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并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的话,也就不可能引发中国史学界这么大的兴趣。历史学家并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它要解决现实提出的问题。尽管历史学家们要研究的学术问题有千千万万,然而只有能使历史学家感兴趣的那部分内容才会引发他们大规模地投入精力物力去研究。其中,由于环境史学的研究所受关切度高也就自然成为近年来史学界一个新亮点了。否则,没有社会需要和需求,没有中国环境问题给学术界提出的挑战和课题,也就不会有学术界的应战和研究。中国环境史学的研究固然受到外国学术界的影响,但20世纪80-90年代环境问题受到中国史学界的重视,也是由于这一时期中国环境问题日益凸显之故。否则,如果我们没有环境问题的切肤之痛,也不会在学术界形成潮流,或不会形成研究热点。例如,2003年“非典”发生后,受流行疫病给社会带来灾难和混乱的现实刺激,史学界很大一部分学者开始转向灾疫史的研究,以寻求借鉴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故此时史学界有关疫病史研究成果的大量出现,就最能说明问题。

在这里还要特别强调的是,环境史学在当代中国的崛起有着丰富的本土渊源。即环境史学在中国并不是建筑在空中楼阁之上,而是有着深厚的学术土壤。否则单靠几个人的引进也只能昙花一现。到底中国环境史学的兴起是直接承继本土学术渊源,还是在西方环境史学的启示之下,在学术界已引起不同看法,并展开过相关学术讨论。与从事世界史研究学科背景的学者强调环境史学外来说不同,中国史学者则认为,20世纪30年代历史地理学在我们兴起与发展的同时也孕育并催生了环境史研究。朱士光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环境史的兴盛,虽然也受到国外,当然包括英、美等国环境史学家们学术思想与研究方法的影响。但毋庸置疑,其渊源还在中国自身蕴涵的丰厚的史学以及20世纪30年代兴起并发展成熟的历史地理学的激发。”〔17〕明确强调了当代环境史学的兴起直接继承了历史地理学。

虽然笔者同意朱士光关于环境史学在当代中国的崛起有着深厚的本土学术渊源的观点,但是笔者主张还是应从更广阔的学科背景去思考更为准确,即中国环境史学的兴起并结出硕果,是建立在本土学者共同努力的基础上的。如气象学家竺可桢1922年就讨论了地理对于人生的影响问题〔18〕,1973年6月发表的《中国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被认为是环境史学的代表作品。历史地理学家文焕然对于野象地理分布及迁徙的研究也是环境史的典型问题,具有代表性。

此外,从事农学、水利、社会史以及灾荒史学者,都曾为这个学科的产生作出过贡献。以农学史、林学史及灾害史为例,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诞生的许多农林专业杂志,如《农报》《农林新报》《农声》《中华农学会丛刊》《农事双月刊》等,以及非农林专业的《科学世界》《东方杂志》《新人周刊》《新生命》《工业安全》等杂志上,就曾发表了大量属于环境史学方面的文章,如黄瑞采译的《中国北部森林之摧残与气候变为沙漠状况之关系》,徐善根的《陕北之飞砂问题》,祖逊的《二化螟虫为害与环境之关系》,凌道扬的《我国及广东之荒地问题》,徐宗士的《中国灾荒问题之考察》,方正三的《农业灾荒与农业气象》,祝锡元的《环境与疾病》,天明的《自然环境与中国历史》、叶在和的《从自然环境影响到社会谈到云南文化之落伍》、胡光源的《开封的风沙》、史维新的《我国燃料问题》、哲生的《都市与煤烟》、毅贤的《摧残都会健康的煤烟一及其预防法》,邓远澄的《大都会的煤烟防止问题》、成聚的《黑烟笼罩下的鞍山》等,都可以看成是环境史学方面的文章。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最早由从事历史地理学的一批学者转向历史环境问题的研究并与从事灾荒史的学者一起共同构成了研究历史环境问题的基本力量。中国水利、气象等部门研究人员近几十年所编辑的《清代江河洪涝档案史料丛书》《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中国历史大洪水调查资料汇编》等,为环境史学提供了可靠的气象资料。国内灾害史的研究兴起于80年代,中国第一届全国灾害学学术会议1987年5月召开,2011年1月6日~8日,已经召开了8次,发表了大量灾害史方面的论著。由李文海主编的全12册的《中国荒政书集成》是迄今为止较为重要、也是最有分量的环境灾荒史方面的文献资料集。灾荒史其本身就是环境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的边界与外延都比较明确。

总之,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本土学者也在有意无意地从事于广义的环境史学研究。尽管在1990年以前,中国本土学者是在“环境概念缺失”的情况下进行研究的,但是有些内容也已涉及到近代工业文明对于环境破坏这类准现代意义的环境史学内容了。1990年代以后,由于中国的环境问题日益突出,近代工业范式背景下的生产生活方式日益显现出它的致命缺陷之时,一部分对于现实环境问题较为敏感的史学工作者便更加自觉地从从事于环境变迁史的研究。在中外学术交流大开放的今天,世界史学者更多地提供了西方环境史学者的学术理念和研究范式;中国史学者则借助之更多地研究中国本土

的环境史案例,两者共同成就了当下环境史学的进步。

构建有中国特色、有中国人话语权的环境史学科理论体系,亦是当代史学界的重要学术动力之一。中国有着悠久的治史传统,传统史学材料异常丰富。然而为封建王朝服务的传统史学“君史”,在近代,随着建立近代国家的需要而受到“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的“民史”的挑战而被迫向近代史学体系转型。自近代一百多年来中国“民史”的建构过程中,在史学的指导理论、表述体系等方面都深受西方史学的影响,其话语系统也基本实现了与国际史学界的对接。在保存中国传统治史,吸收西方史学元素,拓展、研究并关照中国本土史学问题等方面,表明史学工作者在本土史学适应社会进步方面已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在当代,史学的本土化又获得了巨大进步。一是中国史学体系日渐完善,各种史学边缘交叉学科的出现大大拓展了原有史学研究空间;二是在关乎国家政治经济民生环境等等重大历史问题上,都有史学工作者发声,产生了丰富的资政育人的研究成果。总之,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多年来,史学界在经历了移植、吸收、消化西方史学要素过程后,建构中国本土的现代化史学体系的时机已经成熟。

环境史学作为以研究人类生存环境问题为领域的学科,是历史学介入现实生活的重要窗口。在环境问题日益引起国人关注、人们对自身的健康日益重视的今天,以历史地考察环境问题为己任的环境史学的重要性日益凸现出来,并成为历史学科中的“显学”部分,自然受到史学工作者的重视。20世纪90年代以来,史学界对中国历史上水旱、瘟疫等灾荒史、人为因素影响之区域江河湖泊变迁研究之大量成果的出现,说明史学工作者对于研究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已形成共识,因此,把分散的研究进行系统的整合,把各种环境问题的研究升华为通用的概念和理论,就成为当下环境史学学科建构的急迫任务了。近年来史学工作者对于环境史学从概念到研究范式的不厌其烦的讨论,恰恰好反映了建构中国特色、具有中国话语权的环境史学的现实需要。

## 二、环境史学的研究对象及边界

学科的划分或依研究对象研究领域,或依独特的研究方法而定。环境史学作为历史学的一门新兴的分支学科,也必然有其固定的研究对象。不过它的研究领域或研究对象不应是涵盖整个历史学的内容,即只能是历史学研究的某一部局或某一部分。笔者以为,环境史学应以历史上与人类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环境作为研究对象或固定的研究领域。且作为环境史学研究对象的“环境”,也就是我们人类在地球上生存的空间状态,既以人类的生存标准的优化作为判断,以对于人类的优劣危害程度作为客观标准而认识的环境。环境所涉及到的内容非常广泛,有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道德环境、法律环境等等。本文这里所讲的环境主要是狭义上的人和自然相互关系所产生的环境问题。从大的方面可分为自然环境与“人造环境”两大部分。这里有几点必须强调:一是该学科所研究的“环境”是历史上的环境,不是现实的环境。不过现实环境可以提供一种参照,可对其做历史的考察;二是这种环境必须是直接或间接与人类相关联的,非此则可不做为研究对象;三是生态学、气象学等自然学科的成果和研究方法,可以拿来为环境史学所用,亦可将其整合到历史学的知识体系中去。四是环境史学不等于生态学或气象学,不能相互取代。否则,环境史学便失去了独立存在的意义。

### (一)原始自然环境制约并影响人类

所谓自然环境即是指先于人类而存在的环境。如地形(平原、山地丘陵、崇山峻岭、沙漠、江河湖泊等)、土壤的肥瘠、温度高低、水质优劣、空气清浊,一年四季、寒暑昼夜等皆为自然环境的构成要素。人类依赖自然环境而得以生存,自然环境往往规定着特定地域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及民族习性。其皆因人类适应环境而形成[19]。

西方思想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 1689—1755)、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都曾讨论过环境对人的影响问题。孟德斯鸠认为,人们在寒冷的气候下有较充沛的精力,而在闷热的地方,则会感觉到“心神非常萎靡”。“在寒冷的国家,人们对快乐的感受性是很低的。在温暖的国家,人们对快乐的感受性就多些;在炎热的国家,人们对快乐的感受性是极端敏锐的。”[20]总之,他认为地理气候对人的身体、性格、行为均有影响,并间接地导致了各地法律内容的差异。

黑格尔也强调地理自然环境对早期人类文明的塑造作用。“干燥的高地,同广阔的草原和平原”,其特点是“实体的、不变的、金属的、高起的区域,闭关自守,不易达到,但是也许宜于把冲动送到其他各地”;“平原流域,是巨川、大江所流过的地方”,其特点是“文明的中心,而且还没有开发的独立性”;“和海相连的海岸区域”,其特点“表现和维持世界的联系。”[21]其于此种认识,黑格尔强调由于平原流域有肥沃的土地,这里的居民生活所依靠的农业,获得了四季有序的帮助,农业也就按照四季进行;“土地所有权和各种法律关系便跟着发生了”,所以“在这些区域里发生了伟大的王国,并且开始筑起大国的基础”;而在海岸区域生活的民族则富于冒险,“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观念;人类在海洋的无限里感觉到他自己底无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

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壤上,把他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边,但是大海却挟着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动的有限圈子。”〔22〕黑格尔强调了地理环境对人类的思想行为方式的影响。由于地理环境的不同,形成了游牧民族、农业民族、渔猎海洋民族之别,并形成了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及思想观念。

人依存环境,人离不开环境。在生产比较低下的时代,人主要是环境的奴隶。人的生存首先要适应环境,从而产生了一系列相应的风格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模式,形成了一系列的观念符号系统。譬如中国人强调人应顺应自然环境,于是就产生了天人合一、人和自然共生的文化理念。在其他民族中也有强调人与自然相处的文化理念。

在远古时代,人类只有适应环境才能生存,故生存恶劣(如严寒、酷热等)、资源匮乏的环境是不适和人类居住的,故早期人类居住地都是在环境优美、雨量充沛、四季分明的温暖的河谷地带,这里取水方便,食物供给丰富,较适合人类居住。而在那些高山峻岭、寒冷地带或热带则不适合人类居住,更无益于人类文明的发展。为什么在地球北半球的温带半温带地区都是发达国家?这里很能说明地理自然条件对于人类发展的重要性。在温带、半温带这种环境中,较适合人类居住,但是人类如果不劳动就不得温饱,所以需要人类的劳动,而劳动则是创造一切财富发展文明的重要前提。然而在热带雨林地区,由于一年四季常青,天然食物供给丰富,人类不必进行复杂的劳动就可以获取生存条件,所以在这一地区不易发生新的文明,这就是为什么热带地区即使在现在也是原始社会居多的生活环境。因为衣食不愁,不用劳动就可以生存。那么在极寒之处,人类生存较为困难,同样也发展不了文明,如爱斯基摩人,直到现在仍然过着几乎原始的生活。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只有在酷热、严寒这两者之间交叉的地带,才比较适合人类生存,食物比较充足;但是如果生存的好,人类就需要劳动,故在这一地区较易发展新的文明。这也是环境史学需要考虑的问题,即自然生存环境对人类生存条件的制约和规定。

## (二)“人造环境”或“人为环境”的影响作用

人类在改造自然环境的过程中还形成了“人造环境”或“人为环境”。这是人类活动反作用于自然界所产生的成果。凡是人类给自然环境打上的人为烙印,皆可称之为“人造环境”或“人为环境”。有学者把人造环境专指为运河的挖掘,城市的修建等,这还远远不够,应当泛指人类参与的对地球原始生态环境所施加的影响及改造。人类改造自然是为了满足自身的生存需要,但其结果往往起到的是破坏作用。人类对于地球原有生态环境所施加的影响,自远古时代就开始了,只是在远古时期,这种影响微乎其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中古时代和近古时代,随着人口的增加以及技术方面的有限进步,人们为满足生存发展的需要而开展的对自然的索取,在局部和个别地区,已出现了原有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情况。最为严重的是自近代工业革命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人对环境的参与和改造能力的增强,人们可以在违背自然环境的情况下营造出一种小的人工环境。譬如有些蔬菜和水果不能在冬天生长,我们可以利用现代技术有办法让它在冬天照样生长。再譬如现代建筑及供暖设备的完善,为人类营造了一个冬暖夏凉的生存环境,使人类可以到接近北极的苦寒之地居住,不过这一切都需要煤、石油等不可再生能源的支撑。这就是人造环境。现在的空气污染主要是人造污染,人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反过来又对人造成危害。

许多人类运用科技手段形成的大工程,如大运河的开凿、大型水库的修建、大规模城市建设,以及运用现代科技以使人类的生活更为舒适为目的而形成的各种各样的“人造环境”,尽管极大地改善了人类自身的生存条件,但也带来了诸多灾难。杰里米·里夫金等在《熵:一种新的世界观》一书中就指出了人造环境的极其脆弱性。“1965年11月9日晚,加拿大安大略一家发电厂的一个小小的继电器发生了故障。几分钟内,几乎整个美国东北部停电。成千上万的人被困在电梯和地铁里。街道红绿灯全部熄灭,整个东海岸交通堵塞。夜幕降临后,那些地区便陷入了一片黑暗。没有电灯,没有暖气,他们赖以生存的技术社会的其他许多设施全都没有用了。”〔23〕高度现代化的社会过分依赖电力等能源,没有了电现代城市就无法运转,这在现在社会具有普遍性,这也正是人造环境的脆弱之处。

恩格斯对于人类破坏环境并反过来遭受自然报复的问题有几段非常精彩的论述。他说:“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地球的表面、气候、植物界、动物界以及人本身都发生了无限的变化,并且这一切都是由于人的活动。”〔24〕他强调指出:“只有人才办得到给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记,因为他们不仅迁移动植物,而且也改变他们居住地的面貌、气候,甚至还改变了动植物本身,以致他们活动的结果只能和地球的普遍灭亡一起消失。”〔25〕他还举出人对环境破坏的事例来说明他的论断,“西班牙的种植场主曾在古巴焚烧山坡上的森林,以为木灰作为肥料足够使最能盈利的咖啡树施用一个世代之久,致于后来热带的倾盆大雨竟冲毁毫无掩护的沃土而只留下赤裸裸的岩石。”〔26〕“希腊的山羊不等幼嫩的灌木长大就把它们吃光,它们把这个国家所有的山岭都啃得光秃秃的。”〔27〕“我们已经看到:山羊怎样阻碍了希腊森林的恢复;在圣赫勒拿岛,第一批扬帆过海者带到陆地上来的山羊和猪,把岛上旧有的一切植物几乎全部消灭光〔28〕。”“在欧洲传播栽种马铃薯的人,并不知道他们随同这种含粉的块茎一起把痼疾也传播进来了。”〔29〕恩格斯在这里讨论了人们一



且违反了自然规律就会遭受惩罚的道理。在历史上由于人为的原因破坏生态环境而遭受报复的例子不胜枚举。以破坏了自然界早已形成的食物链而形成的生态灾难,以19世纪70年代北美对于野牛的猎杀最为典型。由于疯狂猎杀,几乎使大平原的野牛灭绝,狼则开始以家畜牛羊为捕食对象,而对狼的灭绝性捕杀,结果又造成了食草动物鹿、野牛等的大量繁殖,破坏草场。在当代美国,中国鲤鱼在其水系的迅速繁殖也对当地鱼类食物链带来严重影响。

尽管人类为了自己的生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居住地的生态环境,为了自己的贪欲甚至破坏遥远地区的自然生态,但是每次对于自然的破坏都必然地遭到报复。恩格斯论述道:“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在山南坡砍光了在北坡被十分细心地保护的松林,他们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把他们区域里的高山畜牧业的基础给摧毁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而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30〕人类往往按照自己的愿望改造自然,然而其结果却往往事与愿违,自然界往往以更为残酷的方式报复人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的大规模活动往往能够在局部甚至在整体上改变自然环境的运动规律。我们出现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有很多方面正是我们人类自身行为所造成的。

从局部来看,人类这种环境的破坏更是清晰可见的。从历史到现在莫不如此,历史上许多国家,由于人口的繁殖对自然的破坏,沙漠化、气候的异常还造成了亡国的惨剧,例如楼兰王国的覆灭就是一个典型事例。中国西部很多地区在历史上曾经是水草肥美的草原、森林或者拥有着适于农业的肥沃土壤。可是随着环境的破坏现在变成荒漠化了,某些地区竟成为了寸草不生的沙漠。一到春天就风沙肆虐,成为沿海地区风沙的主要策源地之一。以辽宁为例,辽宁西部地区在历史上就曾经是水草肥美、森林茂密的原始森林。动物繁多,鸟语花香。但是经过了数世纪,特别是最近一百多年的开发,那里已成为了荒山秃岭,水土流失,灾害频发的贫瘠之地。尽管近几十年来我们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想恢复原始自然状态是非常困难的。再有,东北地区的许多城市是随着近代工业发展而崛起的,像阜新、鞍山、抚顺、本溪等等。随着资源的疯狂开采,目前皆已成为资源枯竭型城市。尽管这些年已下功夫治理,但那里的环境问题依然非常严重,并不是在短时间内就能马上恢复的。

### (三)环境意识和环境观念也应当成为环境史学的研究对象

人类对于环境的破坏有时是基于一个民族优先追求生存发展的需要而招致的。以发展为先,无暇考虑环境影响问题。有时则是基于人定胜天的好大喜功,缺乏对自然的敬畏,纯粹是由于人类的无知无畏造成的。因此有关人类与自然环境紧张动因背后的环境意识和支持这种行为的政府环境政策也应在环境史学的研究框架之内。人类对于环境问题的认识有一个过程,而且这个过程往往是以频发的环境灾难的警示为代价的。以中国为例,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正处于急于实现工业化、“赶超英美”的特殊时期,那个时候在发展观念上仍将烟囱冒烟、马达轰鸣作为工业繁荣的标志;而且环境问题除了还没有象现在这样突出外,更重要的是尚没有形成保护环境意识。所以就不可能有系统保护环境政策出台。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拚命发展经济,逐步形成了向全世界贩卖以中国资源为基础的工业品的经济发展模式。这种以对自然资源无限索取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方式,尽管带动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却超过了以往数世纪破坏的总和。而自然界给人类的报复则是以荒山秃岭泥石流、干旱和洪水;草原过度放牧带来的是沙漠化、沙尘暴;土地过分开垦,化肥农药大量使用造成土地板结和土地荒漠化;矿物资源的过度开采造成了资源枯竭,生态破坏;工业废气、汽车尾气的大量排放,造成了空气污染和灰霾天气;工厂废水、城市生活废水的大量排放,造成了江河污染。此外工业垃圾、城市生活垃圾、废弃电池等有害化学工业品的倾倒,不仅严重污染了城市周边环境,而且还造成了更大范围更持久的污染。上述这些环境污染源不仅在某些局部地区对人民的身体健康构成了威胁,从长远来看也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瓶颈。当代对于环境问题的热议,反映了国人对于环境污染问题的反思意识。我们曾经以高楼林立,黑烟蔽日,马达轰鸣作为一个工业繁荣的象征,现在看来已经落后了。现在人类对优美自然环境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建设环境优美、人与自然和谐、经济持续发展、人民生活富足的生态文明社会已成为国人的迫切追求。这也给历史学家提出了很好的课题,要从历史的角度提供经验教训。

概言之,关于环境史学研究对象及边界的界定,从大的方面而言,原生态的自然环境和人造环境是环境史学的基本研究对象。细分化可包括如下子项:(1)原始自然环境对早期人类文明的形成及影响。早期人类各民族所形成的文化式样,行为方式、风俗习惯,皆为适应所生存环境而产生之结果。(2)人类行为作用于自然环境而产生的影响,人口集聚、大规模移民、土地开发、森林砍伐等方面形成的泥石流、大洪水、土地荒漠化、沙尘暴等的影响。(3)大规模工业化、煤等矿物资源的大

规模开采、汽车在全世界的流行,其所排放的废水废气及光化学污染对人类居住生态环境的影响。(4)战争、异民族统治及疯狂掠夺资源、人员跨国境往来疫病传播所造成的环境灾难问题。(5)历史上各种与自然环境相关联的生活方式、习俗文化的研究。(6)对已往各种环境思想和环境理念的研究。(7)历史上与环境相关的政治制度、社会组织、法律法规的研究,等等。

环境史学的边界非常清楚。凡是历史上与环境相关的事物皆可作为环境史学的研究对象,不过,有些研究却不应包括在环境史学的研究框架,如具体地测定每部机器的污染量、汽车排放量,研究疫病流行病本身的治疗方案、研究森林病虫害的防治,研究受污染土壤有害物质的含量等等,环境史学可以把环境学、生态学以及其他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所得出的相关数据拿来为我所用,但却不应取代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具体职能。此外,环境史学也不能取代史学或其他学科的职能,只能将自己界定在人与自然环境相互关系史这个层面。这样一来,环境史学的边界外延就非常清楚了。

### 三、环境史学的理论与方法

#### (一)环境史学理论

任何一门学科都要有自己的专属理论,环境史学也不例外。有学者主张把生态学理论作为环境史学的理论,笔者以为,生态学理论与环境史学理论两者不应简单地等同或叠加,我们当然可以借鉴相关学科的理论,但环境史学应有自己独特的理论。笔者主张把“生态文明史观”作为环境史学的核心理论<sup>①</sup>。“人类共有—个地球”应当是生态文明史观的重要理念。地球的资源有限,只有爱护我们的地球,保护我们的生存环境,人类才能可持续地生存和发展。全球史视野也应是环境史学理论架构的重要范式。因为空气的污染、水的污染、疫病的传播都是跨国界的,因此,环境史的描述已不可能完全限定在某一国的范围内;而且在世界高度一体化、各国关联度极高的现代社会,发生在任何地点的重大环境灾难问题,都不仅仅是局部的问题,它的发生和治理都必须国际化的,需要国际合作。从环境史问题的研究看也是如此,只有站在全球视野才能把环境事件发生的由来、过程、影响说清楚。

从理论的内在构成来看,熵的定律即热力学第二定律,应成为生态文明史观的核心构成理论。而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特德·霍华德(Howard, T.)所著的《熵:一种新的世界观》一书,为我们初步搭建了生态文明史观的基本框架。其基本理论是:“热力学第二定律即熵的定律告诉我们,物质与能量只能沿着一个方向转换,即从可利用到不可利用,从有效到无效,从有序到无序。热力学第二定律实质上就是说宇宙万物从一定的价值与结构开始,不可挽回地朝着混乱与荒废发展。熵就是对宇宙某一子系统中由有效能量转化而来的无效能量的衡量。根据熵的定律,无论在地球上还是宇宙或任何地方建立起任何秩序,都是必须以周围环境里的更大混乱为代价。”[31]热力学第二定律“它告诉我们每当能量从一种状态转化到另一种状态时,我们会‘得到一定的惩罚’。这个惩罚就是我们损失了能在将来用于作某种功的一定能量。这就是所谓的熵”[32]。

长期以来我们都是恪守热力学第一定律,因为这个定律告诉我们,宇宙中的物质与能量是守恒的,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它们只有形式的改变而没有本质的变化。这一定律使我们对世界抱乐观主义态度,并为我们无限制地向自然的索取提供了理论后盾,反映在历史观上,就是认为人类社会永远会不断进步。不幸的是,热力学还有第二定律,即“熵定律”否定了这一切。“熵的定律摧毁了历史是进步的这一观念。熵的定律也摧毁了科学与技术能建立起一个更像有序的世界这一观念。”[33]熵定律否定了自洛克、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发展模式,因为从生态学角度看“洛克不给地球上每条河流安上水坝,不让每个自然之谜一览无余,不把每座高山敲成碎片榨出石油,他是不会罢休的。”[34]因为这种在当代仍居主流的发展模式不支持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杰里米·里夫金、特德·霍华德两人在著作中强调,“熵定律是无法逃脱的。这个宇宙最高物理定律存在于我们生活的每一方面。……熵定律便成为人类一切活动的基础。”[35]“我们应当牢记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不能创造能量。从来就没有人创造过能量,也永远不会有人能创造。我们力所能及的只是把能量从一种状态转化成另一种状态。……世间万物的形态、结构和运动都是不过是能量的不同聚集与转化形式的具体表现而已。一个人、一幢摩天大楼、一辆汽车或一叶青草,都是体现了从一种形式转化成为另一种形式的能量。高楼拔地而起,青草的生成,都耗费了在其他地方聚集起来的能量。高楼夷为平地,青草也不复生长,但它们所包含的能量并没有消失,而只是被转移到同一环境的其他所在去了。”[36]任何能源在本质上都是—种能量。地球本身贮备的能量对人类来说,一种是在对人类有意义的时间内可以再生的能源,另一种是只在

<sup>①</sup>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指导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从发展的角度看,生态文明史观也应是历史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地质学意义上的时间内可被再生,因而对人类来说只能被看成是不能再生的能源。物质虽然可以循环再生,但必须以一定的衰变为代价。比如我们从地底下挖出一块金属矿石并将它冶炼成一件餐具。在餐具的使用期内,由于磨损,金属分子不断地离开这件餐具。这些离开了餐具的金属分子并没有被消灭,它们最终又回到了土壤中,但它们现在是零零星星地散失在土地里,而不是处于一种聚集状态,因而已不能再像原来那块金属矿石一样被有效地使用了。也许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方法来收回这些四处散失的金属分子,但在同时我们又要付出更多的能量,这种回收已毫无意义了。熵定律的一个最重要观点,就是一种物质形态转变成另一种物质形态的时候具有不可逆性。例如原始森林被砍伐后,再重新栽树,即使树木长大成材了,那也不是原来的原始森林了。一种矿产在理论上是不可再生的。例如我们把地球上的煤、石油都采光、挖尽了,这种矿产在地球上就再也没有了,即在人类存在的时间内再也不会生成了。这就是熵定律。

在杰里米·里夫金他们看来,每一项新技术的发展的确加快了能量的提取和流通的过程。不过这种新技术所体现的所谓效率的提高,实际上只是加快了能量的耗散过程,增加了世界的混乱程度。因为“在狩猎—采集型社会被迫过渡到农业社会以前,人们花了好几百万年才耗尽了环境中的能量。然而,农业环境从开始到最后‘不得不’过渡到工业环境,却只有几千年的时间。只过了短短几百年,人们又耗尽了工业环境的能源基础(即非再生的能源),开始面临一个新的熵的分界线。”〔37〕里夫金阐述了一个事实,就是随着技术的进步,人类从自然界获取资源的速度大大加快了,更重要的是人类自身人性的贪欲,不惜以破坏自然界的平衡为代价来获取财富,追求所谓“GDP”的进步。

应该说,《熵:一种新的世界观》与《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研究报告》在学术思想和发展观念上如出一辙。《增长的极限》是由1968年4月成立的罗马俱乐部提出的第一个研究报告,该报告在丹尼斯·米都斯(Dennis L. Meadows)教授主持下完成,于1972年公开发表。其核心观点是,“地球是有限的,任何人类活动愈是接近地球支撑这种活动的能力限度,对不能同时兼顾的因素的权衡就变得更加明显和不可能解决”〔38〕,因为“如果在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方面(按)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这个星球上增长的极限有朝一日将在今后一百年中发生。”〔39〕强调指出传统西方式的以大量消耗自然资源、高消费、高污染的这种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与此相比,《熵:一种新的世界观》把这一观点更加系统化和理论化,讲得更为透彻。明确讲到了当代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资源占有的不平衡性,是世界秩序混乱的根源之一,“只要我们美国继续每年消费掉世界资源的三分之一,第三世界就不能过上稍稍像样的生活。……如果哪个第三世界领袖允许工业化国家继续掠夺他们的自然资源,那这个人必定是个大傻瓜。”〔40〕强调“熵定律打破了我们的物质进步的观念。它从根本上改变了经济学的基础。它转变了时间和文化的观念,并剥掉了技术的神秘外衣。”〔41〕指出人类要有意识地尊重地球的“资源极限”,因为“我们的生存,以及所有其他形式的生命的生存,都取决于我们与自然和解、与生态系统和平相处的决心了。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能够给自然再生过程以足够的时间来医治我们给地球带来的创伤,那么人类和其他所有形式的生命在这个地球上居留的时间就能更长一些。”〔42〕总之,人类不应把自己看成是主宰自然的生物,反而应当尊重自然秩序,对自然界规则持有敬畏的精神和态度。只有在不破坏自然的生态环境条件下的发展,才会可持续发展。

上述相关理论无疑构成了生态文明史观的基本框架。科学技术在按照人的需要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也极大地改变了人类自身的生存状态。科学技术本身无可指责,关键是我们如何使用科学技术,持什么样的发展道路,采用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模式的问题。其实质上涉及到什么是生态文明的根本问题。文明是文化发展的高级阶段和进步状态。文明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之分,现在还应当加上环境文明或生态文明。环境文明或者叫生态文明是超越于技术之上的,是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生存价值意义上的最高体现。它要求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在不破坏自然和谐背景下发展自己的文明,同时这个文明也将能保证人类的健康和可持续的发展。换言之,就是在维护延续发展自己文明的同时,保护赖以生存的客观自然环境。生态文明观的本质就是合理的有节制的使用自然资源,在维护自然生态平衡的前提下,着眼于为我们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发展资源的一种文明观。那么用这种文明观来考察历史也就成为一种新的生态文明史观了。

基于以上论述,笔者认为,生态文明史观是以热力学第二定律熵定律为科学基础,着眼于人类共有—个地球的理念,以维护人和自然和谐为宗旨,以保护生态环境为价值取向,站在全球视野上来审视、认识和评价历史上人与环境互动关系的一种历史观念。只有在这样一种历史观的指导下,我们才能建构具有全球视野的、为各国学术界同仁所共同认可的环境史学;才能在研究中摆脱传统政治史、经济史的思维模式,在肯定追求人类文明进步的同时,还要考量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作为审视和评价历史的基本准则。

## (二)环境史学方法

任何一门学科都要有自己的研究方法。环境史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历史学科,它首先要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然而由于环境史学作为一门综合性较高的边缘交叉学科,其与生态学、环境学、地质学、地理学、水文学、气象学、生物学、考古学、民

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都有交叉关系。因此,它在研究方法上也应是多元的,即凡是有利于环境史学建设的研究方法皆可拿来为我所用。

从研究方法来看,环境史学至少应有以下几种基本研究方法。

第一,史实综合互证法。中国传统典籍里保留有大量水旱灾疫虫饥荒等灾疫记录,为我们今天研究历史环境变迁问题提供了线索。然而,这些自然天象灾疫的记录比较简单,难以了解全貌和细节,这种情况就需要参照气象学、天文学或考古学、地质学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补充证明。竺可桢在《中国近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对中国五千年历史上文化繁盛,经济繁荣或民族战争、灾害连绵所对应的气候气象等自然环境问题进行了研究[43]。这篇较为经典的气象学论文,证明了盛唐的繁荣与温暖的气候有关,而极度的社会动荡则与极度的严寒和大旱有关。例如,17世纪气候的极度寒冷和大旱导致了明朝末年的社会动荡。黄河流域从1627年到1641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连续14年的严重干旱,从而激发了明朝社会的剧烈震荡,诱发了李自成农民起义,明朝覆灭,满族入关建立清朝<sup>①</sup>。如果相关研究不借助于竺可桢的学术成果便会缺少科学证明。

需要说明的是,在古代有关灾异气象方面的资料主要以文字描述为主,基本没有涉及雨量分布、气温气压、干旱程度等科学化数据化的资料。利用科学仪器检测所得到的气象资料,在欧洲也是近代才开始系统建立的,我国在上个世纪初才有相关记录,但很不完备。因此,前近代时段的相关研究还要借助于日记、地方志等加以补充。现当代的气象资料已较为完备,可以为我们研究沙尘暴、灰霾天气、水灾、旱灾提供科学数据的支撑。故环境问题研究除了依然使用传统史料外,更应尽可能多地利用有关天文、气象、水文地质、农田、森林、工业经济等统计数据和各种科学报告来丰富相关研究。

第二,实地调查法。社会学也叫田野调查法。环境史的研究单靠文字记载还远远不够,还需要辅之以实地调查。历史上发生的任何一场环境灾难,无论是自然的水旱瘟疫灾害还是人为的化学污染、重大环境事故,都会留下灾害痕迹,这正是实地调查成立的前提。一场大水过后,农田被冲毁留下大量沙土碎石,这都是现场的,可以根据泥沙碎石情况判断灾害程度。历史上环境灾难在地质上形成的痕迹,如土壤中放射性物质的含量,某个特定海域中某些有害元素的含量等,这些都是研究某区域环境污染的重要证据。再譬如对某一地区较为集中发生的特种恶性疾病的实地考察也很重要的。中国很多地区发现有癌症村、癌症乡现象,对此,可以实地调查当地的环境污染原因,如工厂设立的历史,当地的生活方式,当地的水质、土壤、空气质量以及当地植物标本等。一般来讲,当某一地区恶性疾病的发生已超出正常值并出现极端情况之时,说明这一地区的污染已相当严重。癌症村的周围一定有很多的化工厂,喝的水是污染的水,呼吸的空气是被污染的空气,吃的食物是受污染的食物;此外,某种职业病还与特定高污染行业的从业人员相关联。煤矿第一线的掘进工人因为天天用电风镐掘煤,吸入大量的粉尘或煤尘,所以矽肺的发病率非常高,一个壮实的小伙子到四五十岁的时候,肺就堵死了,变得石头一样,叫做矽肺,因为无法医治而痛苦地死掉了。此外还有水泥厂、铝厂、铅厂、钢铁厂、化工厂等一线工人都有专属行业的职业病,对此都可以实地调查,可以实地了解有关行业的污染情况。

实地调查法应用的范围非常广泛。许多环境问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显现出来,只有长时段的史学考察方式才能把环境问题从发生到产生实际影响的来龙去脉搞清楚。如沙尘暴、灰霾天气等都是需要实地考察,获得亲身感受,深知其危害,才能述之真实。

第三,口述访谈法。学术界对口述访谈法的论述较多,所用程序大致相同。首先要选定具体要研究的环境灾难事件,寻找当时亲身经历的当事人或目击者进行访谈。在访谈之前应做好准备工作,如录音、录像设备,笔纸等,还要设计好访谈的问题,如向当事人询问事件发生的时间、原因、经过、灾难程度、个人经历感受等,谈得越细越好。口述资料由于其内容鲜活,有现场感而为学界所看重。但由于口述当事人文化程度、当时的身份及个人感受等原因,使口述史料在真实性方面存在缺陷,故使用相关口述史料时,还要与具体档案记载及其他文字记载进行互证,方可使用。

第四,计量统计法。所谓计量统计法,就是运用数量方法、统计学的方法来研究分析历史事件的一种研究方法。以研究某一特定城市的环境污染为例,在现代城市中各种各样的污染都是随处存在的。譬如研究城市灰霾天气情况,就可以某一城市近10年—20年为时间段,利用气象资料中灰霾天气的记录进行统计,然后就可以得出该城市的大气污染程度情况。恶性病的统计也很能说明问题。若某城市或地区发生的某种恶性病具有统计学意义,即在该地区或该城的居民中患某恶性疾病的人群在某一特定时段呈现多发状态,出现了超出正常值的极端状态,就说明该城区的环境污染相当严重,具体方法可

<sup>①</sup> 王昌会关于中国五千年气候变迁与历史互动关系,蓝勇在《唐代气候变化与唐代历史兴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k]2001(16):58)一文中的观点显然都受到竺可桢气象学成果的影响。

以选取当地医院病志档案进行统计,可以获得发病死亡人数,病情状态以及病人居住地分布等信息。这使环境史问题的研究获得了可信的事实证明。还可以有针对性地居住在化工厂等高污染企业周围的居民发病率进行统计,以此来判断环境污染程度并对该地的污染历史进行评估判断。

上述所列方法只是环境史学中几种常用的研究方法,自然科学中还有很多有效的研究方法可以用之于环境问题研究,环境史学毕竟属于历史学的一个边缘交叉分支学科,那么它应以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为主。

#### 四、环境史学的研究意义及存在价值

环境史学是人类为应对环境问题而建构起来的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在自觉地建设生态文明这一文化自觉意识推动下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其在拓展史学研究领域,增加史学的科学要素,扩大公共史学领域方面具有重要研究意义和存在价值。

##### (一)环境史学拓展了史学的研究领域

传统史学主要研究历史上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至于历史上人与自然环境、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关系,基本不在主流研究范围之列。尽管中国古代典籍中有大量关于自然灾害等环境问题的记载,且时间较早。不过,有意识地用一种理论和方法使之形成一门学科并且专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在古代还没有形成。另外,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很长时期里,由于现实社会之需要,经济、法律等学科获得了迅速发展,相关学科的膨胀逐渐压缩了历史学原有的学科空间,诸如经济史、法律史等都被纳入到其他相关学科中去,史学只剩下干瘪的躯干了。只是近十余年来史学学科的空间布局稍有改观,特别是以环境史学为代表的一批史学新兴学科的崛起,在拓展史学的新研究领域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这方面,环境史学贡献尤其大。

首先,涉及范围广阔的环境问题被纳入到史学的研究范畴中来,大大扩展了史学研究空间。环境史学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凡是人与自然所产生的互动关系问题都是环境史学研究的内容。古时代由于人口的增加以及不良的生产生活方式对环境造成的破坏自不必说,尤其是近代以来,伴随着工业革命而来的人类对于自然的攫取、掠夺所造成的环境破坏,超过了历史上数千年人类对自然环境破坏的总和。土地沙化、荒漠化,沙尘暴、泥石流、极端暴风雨、光化学污染、让人透不过气的灰霾天气,水污染,食品污染等等,这些都是历史上很少出现或未曾出现的环境问题,相关问题纳入史学研究范围,无疑大大扩展了史学的研究范围。总之,环境史学大大扩展了传统史学的历史思阙和空间思阙,增强了历史学参与社会现实问题的能力,增加了历史学关注环境问题的重要部分。

其次,史料的运用范围较前更为广泛。环境史学所使用的基本史料,如环境数据、环境监测报告,历史上水灾、旱灾、瘟疫报告,灾荒记录,地质资料,气象资料,这些都是过去传统史学不用或不常用的史料,现在则变成了经常性的,不可须臾离开的重要史料。所以单就材料来讲,它就大大地突破了传统历史学的研究范围。由于环境史学尽可能多地要运用一些自然科学的方法,科学数据,环境报告,以及天文、气象、地质、水文、森林等各种报告为研究服务,所以材料的取舍明显和过去不同,具有多样性。此外,个人回忆录,笔记小说中经历的某次灾荒体验等口述史料都是环境史研究所需要的。所以史料的运用已较前大为扩展。

再次,扩大了史学的研究手段。环境史学扩大并丰富了历史学原有的研究手段。传统历史学的方法,如考证、辨伪、归纳、分析、概括等,固然仍有其有用性,然而,由于环境史学所面对的特殊的研究对象,逼迫我们不得不利用、不得不使用我们过去不大重视的那些统计数据,不得不依靠科学的研究方法。如果我们不采用地质的、气象的、生态学的这些方法,那我们就不能在研究环境史中获得进展。这表明环境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研究手段结合得更为紧密,采用范围更大。

最后,环境史学的研究还大大丰富了历史工作者的人文素养以及对人类前途命运的终极关怀情结。研究环境与人类互动关系的终极目的是为了人类自身生存的幸福安康。故它首先就要求研究者应有人文关怀,关注人和自然的和谐问题,即对人类的生存价值,对人类的幸福感,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都要有所关怀。如果从事环境问题研究的历史工作者不具有这些条件的话,那就不能很好地阐释环境与人类的和谐边界。

其实很多的环境问题皆为人类自身造成的,人类对自然无限的攫取、破坏是造成人类自身生存条件恶化的根源。人类的贪欲,对金钱无限的追求,以及不良制度(有些制度本身强化了对自然的破坏和索取)、征服民族对被征服民族资源的掠夺和破坏,都是造成环境恶化的根源。尤其是某一民族对自己千百年来生存的土地进行无情地掠夺和破坏,为了一代人的幸福不惜牺牲子孙后代的幸福去掏空本已不甚丰富的资源,如森林、矿藏、石油、煤炭,污染了新鲜的空气和洁净的水源,那

么这个民族是没有希望、没有未来的。环境史学本身的价值追求要求研究者必须站在生态文明史观的高度,对历史上破坏自然生态环境的行为进行鞭挞和批判,对保护自然生态的行为进行褒奖,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资政育人。尽管这些本是历史学中应有之意,但是从来也没有像环境史学这样,使历史学工作者对人类前途命运的思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强化了史学人文系统中的价值导向作用。

## (二)环境史学加强了史学的科学性

环境史学是历史学科中利用科学手段和科学资料最多的学科之一,由于其运用自然科学原理和方法较多,且与自然科学结合较紧密,在客观上大大加强了史学的科学性。要把史学建设成为像天文学、地理学、生物学那样的科学,这是上个世纪 20 年代末傅斯年代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提出的奋斗目标<sup>①</sup>。由于“科学史学”派在历史研究中大量借助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使历史学中的科学成份大量增加,使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的信念增强。而环境史学的产生,可以说是中国史学与自然科学结合的第二次跨越。环境史学将大量科技成果引入到人文学科中增加了历史学科的科学性和实验性。历史学原有的对史料的考据方法,已经很接近科学意义了,然而,环境史学直接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其研究中涉及到的每一个问题都要用科学的数据,用大量的经济数据、环境数据来说明,使用科学资料来说话,所以环境史学更接近于科学。

不过,历史学毕竟不是自然科学,它除了有科学知识系统外,还有一套与之平行的人文系统。它的学术研究又以提高人类的幸福为旨归,融汇了人文关怀和道德评价,所以这种研究是别的学科不可代替的。它对环境的综合研究也是其他学科不可代替的,它补充了其他学科的缺陷,使研究具有综合化特征。利用自然科学技术和统计数据,利用多种学科综合研究这是史学的一大特征。环境史学在充分利用自然科学方法和资料的基础上大大丰富了人类对自然环境问题的历史思考,客观上丰富了人类思想宝库。它在总结人类于环境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在建设生态文明,学会与自然和谐相处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 (三)环境史学扩大了公共史学领域

历史学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它除了提供学理和知识背景外,在塑造人的精神世界,增加人文素养,培养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以及资政等方面亦具有独特功能。按照笔者的理解,史学有基础史学与应用史学之分。史学可以有五个层面。最高层面,即第一个层面是历史学精神,历史哲学及一般史学理论;第二层面是历史学的技术层面也就是历史方法;第三个层面就是历史学的具体学科;第四个层面是历史知识;第五个层面是史料。这五个层面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只能在学理层面进行分类,却不能在具体运作中分开。哪怕在最低层面的操作中,史学的核心价值、史学理论和方法也会同时发挥作用。以史料为例,史料只有经过史学工作者的加工并赋予其意义才能转化为对人们有益的知识,能不能转化成为普通百姓接受的信息符号并且融入日常生活知识当中,对人生的丰富和发展起作用,这就有一个历史观、人文精神在里边起什么作用的问题,这也是历史学科走向公众生活的重要路径问题。

带有公共性质的历史内容甚多,如历史上的灾疫应对、公共卫生防疫、城市发展、公众参与、社会福利等皆是,其中环境史学即是公共史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性本是历史学的本质属性。历史学不是国家或意识形态的专利,更不是职业历史学家的专有垄断品,公共历史要求归还两样原本属于它的东西:一是历史的真实性即科学性,人们要求了解历史真相;一是再释历史的合法性即民众书写其所亲见亲闻历史的合法性。过去这两样东西只属于国家史学,即国家意识形态政治化了的历史学,而不属于依据公民文化自觉的公共史学。而环境史学由于其直面民众所关心的历史热点问题,故它能很好地解决公共历史阐述中的科学性、真实性和合法性问题。

环境史学所研究和讨论的大都是公共历史问题。历史上发生的几乎所有的环境问题和环境事件都是公共问题或公共事件。无论是水灾、旱灾还是瘟疫流行病,抑或水污染、空气污染、转基因等问题,其受影响的范围都是某一地区性或群体性的,属于公共层面的内容。相关研究涉及到国家的环境政策、法律法规,环境治理以及受害者赔偿等问题。特别是在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当代中国,因环境问题关乎整个民族健康,且人们的环境意识普遍觉醒,公民要求对环境问题有知情权和参与权。互联网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公众的知情和参与问题,更使环境问题成为公共话题,因此,相关研究不仅能使历史学更深入地介入到公共事物,研究公共领域的历史问题,同时其研究成果亦能为大众所关注所了解。当此之时,历史学家们有意识地借助于公共环境问题的研究,向公众介绍历史上环境灾难的经验教训,培养其尊重自然生态的文明意识、历史认识,便是在客观上强化了历史学的公共性,提高了人们对于公共史学的认识。

<sup>①</sup> 参见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原载 1928 年 10 月《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册。

总之,公共性是历史学的本质属性,公共历史是其关注的重要领域,这个领域包括环境史学。因此,让史学从学院式的研究传播方式中解放出来,使之走向社会,走向公众,参与现实生活,更好地发挥史学的公共性,在这方面,环境史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它搭建了史学走向公众的桥梁,客观上增加了史学的公共部分,扩大了公共史学领域。

#### 参考文献

- [1][4][10]高国荣. 什么是环境史[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
- [2]包茂宏. 唐纳德·沃斯特和美国的环境史研究[J]. 史学理论研究,2003,(4).
- [3]陈林博. 重解“荒野”:威廉·克罗农的环境史学思想述评[D]. 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12.
- [5]景爱. 环境史:定义、内容和方法[J]. 史学月刊,2004,(3).
- [6]包茂宏. 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J]. 史学理论研究,2004,(4).
- [7]王利华. 生态环境史的学术界域与学科定位[J]. 学术研究,2006,(9).
- [8]王利华. 浅议中国环境史学建构[J]. 历史研究,2010,(1).
- [9]王利华. 中国环境史学建构的几点设想[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09-22(第B02版).
- [11]梅雪芹. 环境史学与环境问题[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6.
- [12]梅雪芹. 从环境的历史到环境史:关于环境史研究的一种认识[J]. 学术研究,2006,(9).
- [13]滕海键. 环境史学与西辽河流域的“环境史”研究[J].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
- [14]王利华. 作为一种新史学的环境史[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
- [15]高国荣. 环境史在美国的发展轨迹[J]. 社会科学战线,2008,(6);环境史学与跨学科研究[J]. 世界历史,2005,(5);滕海键. 环境史学与西辽河流域的“环境史”研究[J].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6,(2).
- [16]高国荣. 环境史在欧洲的缘起、发展及其特点[J]. 史学理论研究,2011,(3).
- [17]朱士光. 关于中国环境史研究几个问题之管见[J].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梅雪芹. 中国环境史的兴起和学术渊源问题[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2).
- [18]竺可桢. 地理对于人生之影响[J]. 科学,1922,(7卷)(8).
- [19]焦润明. 地理环境与文化变迁[J]. 中国地名,1998,(3).
- [20]孟德斯鸠. 论法的精神(上册)[M]. 张雁深,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229.
- [21][22]黑格尔. 历史哲学[M]. 王造时,译.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91、92-93.
- [23][31][32][33][34][35][36][37][40][41][42]杰里米·里夫金,特德·霍然华德. 熵:一种新的世界观[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83、4、29、4、22、218-219、28-29、59、170-171、19、61.
- [24][25][26][27][28][29][30]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9-330、274、396、379、381、383、383.
- [38][39]李宝恒译. 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研究报告[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95、19.
- [43]竺可桢. 中国近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J]. 考古学报,1972,(1).

## An Brief Introduction to Environmental History

JIAO Ren-ming

(Research Centre for Cultural History of Modern Society, History School,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36, China)

**Abstract:** Environmental history is an emerging cross-discipline which bridges the gap between history and the natural sciences. Its object of study mainly includes human-environment interaction, natural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 on human activity, impact of human activities on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view of history is the central guiding theory; its research methods are made up of traditional history research methods, and methods employed in other social sciences and natural sciences, among which comprehensive mutual verification between history and facts, fieldwork, oral interview, statistical methods are the most effective. The discipline expands the field of historiography,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increasing scientific elements and strengthening the publicity of historiography.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history; eco-civilization view of history; public history

【责任编辑 孙 琰】